两会

中国科学报

CHINA SCIENCE DAILY

主办：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　扫二维码 看科学网　扫二维码 医问医答

总第 6751 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4
邮发代号：1－82

2017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三　今日 8 版

官方微博：新浪：http://weibo.com/kexuebao　腾讯：http://t.qq.com/kexueshibao-2008

www.sciencenet.cn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收到议案 514 件

代表建议 8360 件 目前正协调有关部门落实

据新华社电 3 月 13 日，记者从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处了解到，这次大会期间共收到代表团、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 514 件。其中，立法方面的议案 492 件，监督方面的议案 16 件，涉及有关决定事项的议案 6 件。

据了解，代表提出的议案主要涉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围绕构建发展新体制完善法律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内容。

据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处议案组副组长孔平介绍，这次大会代表提出的议案不仅数量上比去年的 462 件有所增加，而且更加注重质量，通过专题调研、视察或座谈走访等方式形成的议案有 350 件，占议案总数的 68.09%；代表提出的法律案中，有许多还同时提出了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

“一年来，代表们积极参加专题调研和集中视察等履职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依法履职尽责，为大会期间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做了充分的准备。”孔平说，“目前，大会秘书处议案组正抓紧对代表议案逐件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由大会秘书处按程序提请大会主席团审议。”

据孔平介绍，在认真讨论和提出议案的同时，代表们还针对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提出建议。大会期间，大会秘书处议案组共收到代表建议 8360 件，目前正在逐件协调落实代表建议的承办单位和部门。**（罗争光、张晓松）**

半月谈·移动医疗

移动医疗：给健康多一份呵护

■本报记者 张思玮

话题：移动医疗

预约挂号、支付随访、出院后管理……越来越多的移动医疗产品开始走入我们的生活，特别是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移动医疗发展趋势更为迅猛。

但现实中，移动医疗似乎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大型三甲医院依然人满为患。那么，未来移动医疗会否助推“健康中国”建设，还将面对哪些问题？让我们来听听代表、委员们的观点。

访谈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京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刘志军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教研室教授丁洁

医疗是有温度的

《中国科学报》：互联网的出现为医疗带来了“新鲜血液”，让就医更便捷，会不会有那么一天，移动医疗将传统医疗取而代之？

程京：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但也要清楚，移动互联并不是万能的。移动医疗确实有其优势，但它不可能取代医院、医生、护士的核心地位，更不会改变患者对医生的信赖和情感。

《中国科学报》：传统医疗和移动医疗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取长补短、协调发展呢？

刘志军：相比传统医疗，移动医疗在信息采集、数据传输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仅靠这些优势，并不能解决实际的“看病”问题。医疗是有温度的，如果医患之间缺乏面对面的交流接触，仅仅通过冷冰冰的仪器得到的数据、影像等资料，医生无法更好地对患者进行诊断，患者也不会有良好的诊治体验。

丁洁：医学永远是个体化医学，即便是相同的病症，也会有不同的治疗方案。移动医疗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解决一般性规律问题，但做不到个性化诊治。移动医疗与传统医疗也并非对立、取代的关系，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治病救人。

数据与临床经验共“发力”

《中国科学报》：移动医疗让病人就医更便捷，对医务人员会有哪些“利好”？

刘志军：如果移动医疗能够在保证医患之间充分沟通、有效交流的基础上，再加入互联网技术、数据分析的支撑，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医护人员压力过大的局面。比如，过去医生看病多为经验积累，年资高的医生可能临床实践能力更强，如果能够通过大数据汇总分析领域内知识，再加上医生自身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就可以更好地对患者进行精准诊疗。

丁洁：其实，这几年移动医疗并没有解决大型三甲医院人满为患的现状。要想缓解这一局面，移动医疗应该在分级诊疗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让大医院的专家不再整天看感冒发烧，发挥他们在疑难病症方面的专长。此外，移动医疗还要在提升医疗质量上下功夫，扭转医生“只关注病，而不看人”的观念，把疾病有效管理起来，对患者有诊断、有治疗、有回访，让患者得到全面的关怀。

《中国科学报》：未来，移动医疗产品应该朝着哪些方面发展？

程京：让医务人员从繁忙的临床工作中解脱出来，就应该减少疾病的发生。所以，未来移动医疗应该在预防医学与康复医学上发力。移动医疗产品通过对特定人群的数据采集和分析，进而归纳出对疾病相应的干预技术和康复方法，并进行推广，从而做好疾病预防与康复工作。

隐私保护从立法入手

《中国科学报》：在医疗大数据时代，如何才能让患者的隐私得到有效保护？同时，又该如何真正地实现数据共享，共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程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化健康信息，这属于个人私有财产。国家应该在立法层面上予以保护，而不仅仅是行政指令。我们可以参照信用卡的制度，来管理和保护个人健康隐私数据。在数据共享方面，首先应该考虑标准化的事情。只有在相同的标准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数据的共享，否则两个系统根本不兼容，数据共享就无从谈起。当然，这里必须强调一点，政府应该指定某一权威部门具有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和调拨个人健康信息的权力，以用于全民健康的研究、规划等事情。

丁洁：移动医疗加剧了信息的“大爆炸”，一旦患者信息泄露，可能就在社会上无边际地“发酵”，形成舆论漩涡。我们应该从意识方面、技术方面、法律方面切实保护好患者隐私。对于社会各方已经获取到的大数据，如果不能实现互通有无，就会逐渐变成信息“孤岛”，而要实现数据共享首先应该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然后再制定企业的相应规则，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中国科学报》：医务人员应该如何抓住移动医疗时代的发展机遇？

刘志军：随着移动医疗的快速发展，医务人员也要积极面对，加强对新技术的学习与交流。同时，在医学生培养上，我们也应该探索出适应移动医疗时代的模式。

当然，移动医疗发展不能急于求成，宁可慢些、审慎些，也一定要注意医疗安全，千万不能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任何技术运用在性命攸关的医疗健康领域，都要坚守医疗本源，不忘初心。

记者观会

“烧脑”的两会

■本报记者 丁佳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已经接近尾声，由于这是本届全国人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大家有的会影留念，有的在大会纪念信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用这样简朴的方式纪念自己的参会经历。

对大人代表来说，像这样聚在一起集中讨论的机会，也许每年只有一次。能够看出他们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积极在每一次的全体会议、小组讨论中建言献策，履行自己的职责。

与政协会议按照界别、行业分组的形式不同，人大代表们来自五湖四海，当各行各业的人坐在一起时，讨论的话题往往非常“跳跃”——会儿是司法建议，一会儿是科技创新，一会儿是文化教育，一会儿是民生改善……

真所谓“话锋转得大快就像龙卷风，杀死了脑细胞来不及记”，可恰了我们这些听会的记者啦。

不过仔细想想，这也是必然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发展，要国富民强，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千头万绪，也需要这些参政议政的代表、委员们集思广益，一起提建议、出主意、想对策。

所以，多绕绕脑，也是大有裨益的。

▲全国人大代表们在翻看材料。　丁佳摄

◀全国人大代表周有财（左）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讨论药产业发展问题。　陆琦摄

▶黑龙江代表团两位代表在会议间隙讨论立法程序问题。　陆琦摄

一维码打开『两高』大门

■本报记者 陆琦

继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首页印上二维码、展示中央政府过去一年目标完成情况之后，3 月 12 日提交人代会审议的最高法、最高检工作报告，也在文本中印上了二维码。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位连续 3 届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感慨道，“这么多年了，一直觉得‘两高’的门特别难进。”

可见，就算是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也觉得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距离还挺远。更何况咱们普通老百姓呢？

此次，除了用 H5 等新媒体形式展示“两高”在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外，最高法报告附件中的二维码，还链接到包括裁判效果在内的 9 起社会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庭审视频；最高检报告则附有 12 个二维码，可以扫出 1200 余位代表委员过去一年对最高检工作提出的意见建议。

如果说，在报告中印二维码体现一种亲民姿态，那么，“扫一扫”便能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干货”，则充分彰显了司法机关自我革新的勇气和对工作成效的自信。

公平正义走在前列。我们期待，报告上印二维码这种互联网时代的创新之举能从今年开始成为两会惯例，通过更充分的信息公开扩大代表的知情权。我们更期待，司法机关能以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知识产权管理分散 代表委员建言『三合一』

■本报记者 李晨

两会期间，九三学社在一份提案中建议组建国家知识产权总局（总署），引起了知识产权界的极大关注。该提案建议，由该机构统一行使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各类知识产权的行政管理职能，统一负责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政策引导、公共服务、确权认证、市场监管等工作。

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印发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为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拉开了大幕。

无辜的知识产权部门

去年底，四川省政府部门进行行风测评，其中受访者对知识产权部门的意见包括“商标注册办事效率低”“应加大对侵权问题的查处力度，及时制止侵权行为”等，这让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知识产权局局长谢商华感到很无辜。

因为受访者不清楚管理部门的职能，而把版权、商标等问题也归结到知识产权部门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企业对知识产权多头分散管理的困惑”。谢商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她在调研中发现，知识产权的多头分散管理和分散执法，已经难以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无独有偶，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丁荣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到，他调研的企业中 60%以上都有统一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但如果要去申请专利、版权或者商标，就得去不同的政府部门。“这会增加行政成本。所以企业也希望统一管理。”

多头分散管理限制效用发挥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188 个成员中，有 181 个实行综合管理体制，其中采取专利、商标和著作权“三合一”管理模式的近 40%；采取专利和商标“二合一”管理模式的占 55%。而我国一直采取专利、商标、版权分散管理模式。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告诉记者，管理多头分散，确实影响了知识产权制度作用的发挥。

首先，多头管理降低了管理效能，诸多可以由部门内部协调的事项变为部门之间协调，或变成多部门之间协调，增加了协调成本，浪费了行政资源；其次，政出多门阻碍了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集成运用效果的发挥；最后，分头执法制约了保护水平，容易造成保护漏洞和重复执法。同时，分散式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与企业的需求严重脱节。

何志敏也认为，市场监管只涉及行政保护环节的个别方面，如果将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工作限定在市场监管框架下，将大大压缩改革的空间，无法解决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不完善和分散管理等现实问题。

近年来，一些地方已主动进行了改革尝试。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吕国强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浦东新区率先建立专利、商标、版权“三合一”综合管理体制，在政策顶层设计上，实现了真正的有机统一，避免了知识产权工作分散管理的政策冲突与抵触。

而作为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四川省从上个月开始了一项更为彻底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谢商华介绍说，今年将至少有 1 个市、6 个区县专门设立知识产权局，并成立知识产权执法大队和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实现综合管理和综合执法改革先行先试。

集思广议

全国人大代表冯长根

推荐自然而然的成果评价法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科学的科技成果评价能够更好地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营造科技创新环境，展示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创新水平。目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冯长根提出：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科技成果评价方法，建议政府有关科技部门在工作中予以采纳。

在冯长根看来，我们每年都要发表成千上万篇优秀的科技论文，如果今年的科研成果在发表时，作者对去年、前年别的同行对本课题“添砖加瓦”的成果予以评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自然而然的科技成果评价平台。这个庞大的平台，只需要每位成果获得者在一篇论文中多写一句话，多一句前人成果的评价性的介绍。它们为今天解决成果评价问题，为科学、合理地反映科技工作者的劳动价值，完善当下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我们今天呼吁的科学的科研成果评价，它们其实就自然而然地摆在眼前。

冯长根指出，要做好这件事，首先要从提升我国科技工作者的话语权的层面重视这个平台。其次，要充分重视在学术论文中体现学术链，这简单到只需通过在学术论文中使用准确、合适的评价性语句就可实现。建议主编、编辑、审稿人要从“学术裁监”把门人的角度，促进发表更多的优秀学术论文。如果能够坚持这样做，中国科技界就会摆脱唯 SCI 评价的负面影响，同时又坚持了其中科学、合理的部分。

全国人大代表陈康平：

光伏扶贫，让老百姓得实惠

■本报记者 陈欢欢

履职故事

全国人大代表、晶科能源 CEO 陈康平今年提的议案是光伏扶贫。在自己老家行上，陈康平连续几年呼吁加大光伏扶贫的力度，随着近一年来晶科光伏扶贫项目的不断增多，陈康平又有了新的经验和感受。今年他再次呼吁：“光伏扶贫不受天灾等因素影响，经济效益好，能带给老百姓真真切切的稳定回报，应加大投入。”

一直以来，扶贫都是中央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在操作中也面临许多困难。陈康平经过实地了解发现，养殖、种植等扶贫方式存在天灾人祸等不可控因素，如技术门槛较高、经济效益受整体经济环境影响、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无法参与等，而光伏扶贫则有效克服了这些缺点。

首先，光伏发电清洁环保，技术可靠，收益稳定；其次，同资金扶贫和产业扶贫相比，光伏扶贫操作更简单，易学易会；第三，在农村民居屋顶、空闲地等区域，扩大光伏扶贫电站指标规模，以及扩大分布式规模，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关于土地价格问题，两会期间也有多位代表委员提出，希望能从政策上予以约束。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锁定“三农”工作，其中明确提出“实施农村新能源行动，推进光伏发电，逐步扩大农村电力、燃气和清洁型煤供给”。国家对清洁能源政策持续加码，陈康平也不遗余力地推动光伏扶贫，他深刻地感受到：“光伏扶贫已经成为一项得民心、有保障的扶贫工作，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代表委员呼吁，提高基层科研人员待遇的同时，理性看待青年科学家“逃离北京”——

“不妨给人才选择的自由”

■本报记者 倪思洁 丁佳

就在两会接近尾声之际，一篇名为《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员的自白：我为什么选择离开》的文章，点击量破了 10 万。

文章作者从北大本硕博毕业后进入中科院北京某所工作，最后，却因为买房、子女入学等现实问题、舍泪告别中科院的老领导，转战南京某高校。

“逃离北京”，并非科研界独有的话题。和许多多怀揣着梦想的“北漂人”一样，那些蜗居在北京的年轻科学家，一边承受着科研的压力，一边遭遇着生活的挑战。这一问题，正是今年两会上，科技圈的代表委员们所关心的。

你们的压力我们懂

对于当下北京的生活压力，科学家们都深有体会。“北京的房子太贵了，这个是客观事实。”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王家骐说，即便用他一辈子的身家，在北京也买不起一间稍微宽敞一点的房子。

同样过过苦日子的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袁亚湘，也在为年轻的科学家们着急：“他们的压力我们懂。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有全国最好的科研资源和国际交流环境，也是全国优秀科研人员集中的地方。但北京本身的生活压力大，确实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

对于“逃离北京”的这位科研人员，王家骐认为应该理性地看待，没必要过分解读。这是那个科研人员在对事业、家庭等各方面做出权衡后的一个选择。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姚檀栋同样认为，这个“逃离北京”的故事，代表着一种人才的正常流动。“每位科研人员都可以根据个人的偏好权衡。有些人可能更适合在另一个地方发展。”他说。

每个时代都有长征路

用现在的标准评判，那时候王家骐的工作、生活条件可以说是苦得不得了。

他 1963 年本科毕业，1966 年研究生毕业，一直到 1979 年才评上助理研究员。那时候，王家骐已经 39 岁了，在这 16 年间，他有两个孩子，全家人挤在一个 15 平方米的筒子房，做饭是在走廊，卫生间是公用的。1986 年当所长，工资也只有 200 多块钱。

不过王家骐说，回想起来，那时候并没有觉得很苦。“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长征路，每个人也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要有走长征路的精神。”

在王家骐看来，年轻人不一定非要留在北京工作。“现在中科院在全国各地都有水平很高的研究所，对青年人才来说也是不错的选择。”王家骐说，“即便他选择到中科院外工作，也是一样在为国家科技事业做贡献，应该更加宽容地看待这个问题。”

（下转第 2 版）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王家骐（左）和袁亚湘（右）在交谈。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陈和生在纪念石油上签名留念。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在和同事交谈。　本报记者丁佳摄

两会时评

是时候聚焦科研人员生存环境了

■韩天琪

两会期间，各种关于科技与创新的话题不断见诸媒体，从制度改革到成果红利、从经费管理到成果转化、从大项目大装置到人才培养资金使用，几乎涵盖了科研人员共同关心、关切的所有问题。

然而，突然之间，一封发在水木论坛上的帖子重磅来袭，大有使之前的讨论变得无足轻重的感觉。那就是，对于科研人员而言，最令人揪心的也许不是经费报销如何繁琐，也不是科研评价公不公平，而是如何生存在一线城市。

这篇名为《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员的自白：我为什么选择离开》的帖子的主人公，名校毕业后进入顶级内最好的科研机构工作，却因子女入学和房价过高不得不选择离开北京。也许有人会说，做学问要甘于坐“冷板凳”，要守得住清贫。但一线城市科研人员面对的种种困境却是现实，如被人不及以购得五倍之地，如因产籍、房子问题造成子女入学困难，又如不断高涨的房租和频频更换租房的困扰，等等。

在科研领域，他们是受人尊敬的青年科学家，而走出实验室，他们并没有过上体面、稳定的生活。“居大不易”，科研人员“居大”更充满着纠结和矛盾。离开一线城市，往往意味着离开国内顶尖的学术机构和科研平台；留在这里，自己和家人就只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走或留，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那么简单，而是要在理想和生存之间抛弃一方，这对于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科学家来说，谁是多么无奈！

不可否认，生活压力问题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及领域，常常拎出科研领域似有法名钓誉之嫌。但从国家鼓励科技创新、倡导尊重知识分子、积极为他们营造良好发展空间的角度看，强调优先解决好科技工作者的生活问题，让他们放下负累、专注于创新研究的要求值得考虑。

有人也评会说，这个“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是个特例，而且基于种种考虑的人才流动也属正常现象，不宜过度解读。这样的观点显然过滤了房价、教育、入学、就医等城市生活成本持续高涨的残酷现实，也过滤了他们面对困境涨生的种种焦虑和煎熬。这种观点的潜在逻辑还在于：社会大环境已经如此，遗而对每一个真切的“逃离”都视而不见，甚至习以为常。

（下转第 2 版）

两会大咖说

全国人大代表曲久辉院士：

铁腕治污离不开科技支撑

本报讯（记者陆琦）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环保方面释放的最强烈信号是，要铁腕治污，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曲久辉表示，铁腕治理必须要有科学依据。

“现在的环境治理，管理成为关键制约因素。”曲久辉说，光有科学技术，没有铁腕治理，一定是低效的，也达不到目标。靠科技支撑铁腕管理，靠铁腕管理实现科技支撑才可达到目标。

就环境科学来说，曲久辉直言，靠单一学科方向和单一队伍解决问题、拿出系统方案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认识一些本质规律时。

曲久辉建议，建立环境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这极其重要。”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实现学科交叉，利用大科学装置，提出综合性问题，集中各学科的力量和不同手段进行科技攻关，同时针对现实中的很多环境问题，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然后把这些科技成果向应用转化，推动环保技术的发展。这是一个全创新链的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贺林院士：

呼吁尊重医务人员付出

本报讯（记者黄辛）党的十八大提出了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卫生计生事业发展面临新的历史任务。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贺林表示，人才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而医务人员则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参与者。

贺林认为，绩效工资实施至今，对一些公益类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的员工来说并没有“获得感”。主要的问题是，看似推着“铁饭碗”，实质面临“人难招、人难留”。

贺林建议，加快推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在试点省市的落地。在避免和减缓逐利机制的基础上，尊重医务人员劳动和付出。围绕“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全面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他认为，这样才能增强广大各级各类医务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根据不同岗位当好人民健康的“守卫人”，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深聚焦

让成果转化激发“双创”新动能

■本报记者 王佳雯

在 2014 年 9 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首次在公开场合发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自此，这一理念在我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了热潮。

时隔两年多，科技在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中发挥的作用，正日益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社会各界也期待着通过成果转化，使科学技术在“双创”中能有所作为，成为推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采访中，代表委员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科技人员完全可以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双创”的主力军。

“最后一公里”考验

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与投入不断增加，让科研人员看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也有委员担心蓬勃发展的科学研究带来的丰硕成果会被“束之高阁”。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副所长周玉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科技支撑，而科技成果如果不转化就是一种浪费。”

在她看来，一线科研人员做出科研成果，也最了解成果该如何发挥作用，通过给科研人员奖励等方式支持成果转化，对国家经济和科研人员个人而言，都是一件好事。

不过，这件“好事”如何做成，还面临着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最后一公里”的考验。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黄伟光也指出，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科研论文产出国，我国科研成果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已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黄伟光担心的科技成果难以走向市场的问题，已成为科技供给侧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难点所在，也是许多走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历程的人所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

对如何破解这一难题，黄伟光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通过建立专业转化机构等方式，寻找到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解决办法，让科技成果走向市场变得更容易些。

因为只有成果转化的路径畅通，科技成果才能在激发“双创”活力中释放更大的动能。

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待解

从中科院化学所带着科研成果走出去创业，如今成为某科技企业领头人的全国人大代表杨桂生，在的新创业的亲身经历中也发现了成果转化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不是很了解市场需求，有些成果就像实验报告一样。”杨桂生说。

（下转第 2 版）